

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嬗变

刘德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國務院

一九五五年



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嬗变



刘德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嬗变 / 刘德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161 - 4087 - 1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东汉时代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67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刘跃进

十多年前，我曾根据《汉书》的《儒林传》与《艺文志》、《后汉书》的《文苑传》与《郡国志》以及《隋书·经籍志》等文献记载，对秦汉八个文化区域作了一番统计，结果是，秦汉文化的中心在齐鲁与河洛地区。根据《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所列200位学者的184种著作统计，齐鲁地区数量居第一，占西汉学者总数的55%，河洛地区屈居第三。可见，齐鲁区域文化在西汉时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又根据《后汉书·儒林传》所列56位学者和《后汉书·文苑传》27位学者统计，河洛地区遥遥领先，上升到第一位，齐鲁地区则降为第二位。再根据《隋书·经籍志》综括的秦汉著作总量，共计297种，占第一位的是河洛地区，约占这个时期著作总量的33%，齐鲁地区占据第二位。这个统计无可争辩地说明，西汉文化中心在齐鲁，东汉则在河洛地区。

既然齐鲁文化与河洛文化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积淀可供研究，而我却无从下手。资料匮乏，研究自然无从说起，而资料太多，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困惑。其他六个地区，我都有综合性论述，唯有齐鲁文化与河洛文化，想用几篇文章说清楚，还真不容易。而这两个地区，又有不同。齐鲁地区文化，我还曾抓住“鲁学”与“齐气”两个概念加以论述，而河洛文化则找不到抓手。研究秦汉区域文化，缺了中原部分，显然不成体统，于是，我只是就梁孝王文人集团的构成以及后人对于这一集团的文学想象作一描述，权作“中原文学一瞥”。

明明知道这个领域有很多“富矿”值得开采，而我却无能为力，内心一直惴惴不安，总想找机会对此缺憾做一弥补。恰好这个时候，来自

中原的刘德杰以高分考入文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在考虑选题的时候，我建议她今后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东汉时期的中原文化作深入的研究。这部《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嬗变》就是其中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首先，作者从文士的“地域意识”及其外化行为入手来研究汉代地域文学，找到了一条可操作的古代地域文学研究路径。第一章以“中州意识”为主线，深入讨论了“中州意识”在东汉皇族、中州功臣、流寓士人等各类人群身上的外在表现，论述了他们带有故土意识的政治文化行为是怎样具体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州的建设与发展、影响着士大夫群体对中州的认知与接受。由于东汉皇族有浓厚帝乡情结与京畿优先观念，朝廷对中州给予了种种政策优待。在良好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中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快速而稳定的发展，这正是中州成为东汉文学创作中心的前提和基础。第七章第四节论述东汉关中外戚幕府“关中色彩”的盛衰，同样是以“故土意识”为内在主线展开论述的。东汉关中外戚幕主具有深浅不同的“关中意识”，他们的政治行为（如辟举幕僚、举荐士人）、文化行为、经济行为也就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地域倾向。东汉关中士人地域意识的变化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关中外戚幕府文士的文学创作中，关中外戚幕府文学的“关中色彩”也就随之浓浓淡淡。

其次，作者突破以往孤立研究作家作品的模式，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大家，挖掘本土人文传统与文学家的思想、性格、思维习惯、审美倾向及社会交往之间的复杂联系，揭示文学家的故土情结与其文学创作间的内在逻辑。本书对张衡和蔡邕的研究即是如此。张衡是汉晋清畅文风的先导者，在促使张衡文风形成的诸因素中，故乡荆楚文化的熏陶浸染是根本性的。清代戏剧名家孔尚任说得好——“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抵也。”作者综合分析了有关汉代南阳的典籍记载、民间传说、南阳汉画像石、南阳歌谣等各类文献，从多个角度详细地考察了南阳文化传统与张衡的淡静性情、天文爱好、清远审美、诗性神性思维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张衡清灵简畅的文风与南阳汉画像石的风格非常一致”，“包括神巫文化、楚辞文化、占星

术在内的南阳文化是张衡文化心理的基因”。关于蔡邕研究，本书的视角有二：一是相对静态的地域文化视角，即探究蔡邕的文学创作与本土人文环境之间的各种关联；二是动态的文学创作地理与传播地理，主要论述蔡邕流亡吴会期间的文学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及吴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如“故土情深：笔系陈留兖州间”一节，作者将蔡邕置于东汉兖州这个特殊地域文化环境中，全面分析了政治活动、社会交际及文学创作活动，发现蔡邕对兖州人事特别关注，以翔实的史料和“同情的理解”充分展示了作为一方名士的蔡邕在宗法社会中的真实形象和复杂心态。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作者在学术实践中已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理念和研究特色。本书的研究理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整体观照与具体考察相结合。全书以东汉中原文学为中心，把所有问题都置于汉魏历史文化背景下予以整体观照。从结构布局而言，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从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空间维度对东汉中原文学做了时空定位，属于宏观整体性考察；《余论》既是对主体部分的总结，也是对主体内容的延展，仍属整体研究；中间章节分别研究中原本土文士群体、流入中原的文士群体、皇族文士群体以及外戚幕府文士集团，对每类文士群体的论述都采用了点面结合、宏观微观结合及时空融合的方式，既突显了各类文士群体的文化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时代文化风貌。

第二，文献考实与文化阐释相结合。文献学功底体现的是研究态度与学术积累，对文献的合理阐释则是理论素养与学术识见的集中体现。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两方面都做了积极有效的努力。流寓文士扶风班固和南郡王逸都在东观任职，作者解读了二人在东观创作的文学理论文章之后，总结说：“班、王对屈原的评价看似针锋相对，实则一致，都是遵守‘忠臣之德’，只是一个强调要婉顺于君，一个强调要敢于直言劝谏，尽忠方式不同罢了。更重要的是，王逸衡量屈原作品的价值标准是‘依经立义’，这正与东汉朝廷褒崇‘五经’的思想完全一致，体现的正是文学创作应以经义为准则的国家意识，这是作为国家代言人的东观文士的观点，而不仅是个人看法。”这一论断体

现出了作者对全局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在论述汉章帝“以文学取士”、采取“左右艺文”的文化平衡政略时，作者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文献，诸如经书、史书、总集、别集、子书、古注、杂考、现代研究成果等，皆在其中，而所用材料无不仔细考辨，所下论断亦颇为审慎，文中结论大体信而可征，显示了作者良好的文献学功力与文化阐释能力。

第三，在解读文本中发显大义。文学研究必须细读文本，吃透文本，把文本放回诞生它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解读，体味其内在涵义，领悟其时代特质与文化意蕴。作者自觉实践了这一学术理念。关于张衡诗文风格的研究就是从文本解读开始的。作者不仅深入细致地解读了张衡的诗文作品，还将其与班固、傅毅、蔡邕等东汉文学家的同类作品做了对比性解读，深入而细致地分析了它们的个体差异，同时揭示了时代主流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性格以及个人审美倾向对文学家创作风格的影响。对关中文士的关中意识和关中情结的研究，对中州本土文学家族的家族文学特色的研究等，均是在文本解读中发现问题，从细微处发显大义。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嬗变》还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我相信，德杰会以此为新的起点，突破自我，取得更大的成绩。对此，我充满期待。

二〇一四年仲春撰于京城爱吾庐

（本文作者简介：刘跃进，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主要从事秦汉及六朝文学研究）

序 二

陈江风

十四年前，德杰报考河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来到我的师门之下。初次见面，印象极深。德杰是南阳唐河人，有气质，有悟性。南阳地灵人杰，造就了她的灵动聪慧、勤学好问，使她成为一个很有学术潜质的学生。南阳在两千多年里区划稳定，文化底蕴丰厚，悠久的尚文传统浓缩成了南阳人强烈的文化情结，故乡涵养了她对民族文化的灵敏感觉，一旦条件成熟，便可驾轻就熟地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南阳具有厚重的传统文化生态，造就了她仁爱大气、豁达坚韧的性格。细想来，人之成人原来与自然、与社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河南大学对研究生教学实行导师制。记得第一次给德杰上课，不外乎讲一些做人做学问的道理，谈到文学研究，我要她下“诗外工夫”：一是培养发现问题的习惯，练就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二是文献、理论要比翼齐飞；三是文学研究要有大视野，不分文史哲；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做学问要不断自我超越。没承想，她竟将此书于座右，在后来十几年的学术生涯与教学研究中一直敦行不懈！

德杰的硕士阶段读得很苦。凭着坚强的毅力，中师毕业后，她自学考试一路走来，读学位要下的工夫可以想见。那是一段寒窗苦读、焚膏继晷的日子。她刻苦努力获得了很好回报，硕士毕业时，学术发展势头已初见端倪。博士阶段经刘跃进先生名师指点，她在学术上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登上了基于文学地理研究和东汉中原文学研究的学术平台，并成功实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嬗变研究》的立项、结项。《东汉皇帝的帝乡意识及帝乡意

识下的文学活动》(《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蔡邕研究百年回眸与展望》(《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汉章帝与东汉文学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等一系列扎实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国家项目的顺利结项与即将出版,都可看到她自我超越的学术品格,看到南阳文化情结潜移默化的作用。

德杰令人欣慰的学术成果的取得实属不易。如不是亲历,我很难相信,在若许年的日子里,她弱肩担三代,却依然实现了自我超越的梦想。上有八旬老母,下有黄口小儿,在远离故乡的郑州,她把一家人调和得其乐融融、蒸蒸日上,竟还有如此精力拿下国家项目,撰写大块文章,成就教学科研的一个个梦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女性“桃夭其华、宜其室家”的现代版写照吧。

这本书是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该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研究视角的选择颇具匠心。概要言之,约有其三。一是全书以“中州”为视窗,用文学地理学和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活跃在中州的各类文士群体整个纳入研究视野,注重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动态文学事象的考察,不仅拓展了地域文学研究思路,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多有创新。二是善于“管中窥豹”,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考察宏观整体性问题。如第二章,通过对现存东汉文学作品创作地的详细考察和统计,论述了东汉文学创作地理整体格局的变迁轨迹,不仅抓住了东汉中州文学的基本特点——荟萃天下文豪、引领时代文学主潮,且揭示了文学演变与政局变迁之间的基本规律,即《文心雕龙·时序》所云“枢中所动,环流无倦”。三是善于从多个视角做对比研究。如关于南阳、颍川、汝南三郡文学家族家族文学特色的研究,对流寓士人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理的对比论述,对汉明帝、汉章帝、汉灵帝的文化好尚和文化政略之间的继承与新变的研究等。

仅以上简述,已可见出作者自觉的学术意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至于本书体现出的理论意识,史料考辨评述中所透出的对历史与社会人生的洞察与体悟,以及行文中所呈现或提示的文学地理研究及汉代文学研究的潜在学术空间,等等,当然,也包括某些不尽完美之处,

相信读者自有高见。

2014年4月书于郑州“三榆堂”

(本文作者简介：陈江风，教授，现任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汉画、民俗、文化学研究)

前 言

以今河南省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汉时习称“中州”，这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也是历时最久的全国性政治文化中心。东汉时期，中州首次成为统一帝国国都所在地，以绝对优势引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自光武帝建都洛阳到汉献帝迁都许昌，再到汉末曹操父子以邺城为魏国国都，两百年间，文坛领袖与著名文士或是中州人，或长年生活在中州，中州一直是雄冠天下的文学创作中心。而且，汉安帝时，中州文士群体崛起，成为东汉文学创作的主力，并主导了此后汉魏文化主潮的发展方向。

本书以东汉时期“在中州”的文学之士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为中心，运用多维文学地理视角，考察“在中州”的士人群落的文学贡献，解读、比较他们创作于中州的作品所内蕴的故土意识、国家意识及其冲突与融合，系统论述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地区的文学生态及整体风貌，深入揭示了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勾勒出了东汉士人对洛都礼乐治国模式的接受、认同、弘扬的文化心路。

论著共七章，另有余论一节。

前两章重在对东汉中州文学作宏观整体研究。第一章从两汉文化大背景观照中州文化的意义，以确定中州在文化坐标上的纵向历时点。第二章从创作地理角度确定中州在东汉文学创作地理整体格局中的横向空间点。东汉文学创作地理中心经历了从“一”到“多”的变迁，这是东汉王朝从统一稳定到分崩离析的历史状况的真实反映，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文学与世推移、文学格局常随政治格局的变迁而变迁的规律。

第三、四章研究中州本土文士的文学创作与东汉整体文学嬗变间的关系。

第三章以中州文学家族最为集中的南阳、颍川、汝南三郡为重点,兼及陈留、河南等郡,论述了中州本土著名文学家族的文学成就及其特点,同时关注家族异代成员的文学创作在时运推移中的变化,进而从历时与横向比较的双向维度考察中州文学家族的文学创作与全国文学嬗变间的关系。整体上看,在东汉中原本土文学史上,宗室或功臣出身的南阳文学家族要先人一步;其余诸郡的文学家族稍晚一些,约出现于章、和之际,有的在桓灵之际,他们凭借“经明行修”,通过郡国察举或公府辟除而入仕,又以累世经学而累世宦宦,最终成长为新兴文学家族。安帝以后,这些文学家族逐步进入政治文化高层,成了汉魏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

东汉是家学和士族的肇兴期,文学家族的家学家风,既受地域文化传统与时代文化氛围的影响,也受家族创基人对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中原本土文学家族的成长正是如此。

第四章以南阳张衡、陈留蔡邕两代文学宗师为例,考察地域文化与文学家的文化行迹(或者说文化的空间变动)对文学创作及地域间文化交流的影响。张衡文风,清灵简畅,肇启汉晋文学“清”风,其文风之形成与荆楚文化地理及其人文传统密切相关。一代文学宗师的的活动,往往会产生文化蝴蝶效应,带来多个地域间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甚至为所历之地播撒下文化新生的种子。为此,在研究中原文学家对东汉整体文学演进的影响时,我们着重研究了汉末文坛宗师蔡邕的政治文化活动及其影响。这部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将蔡邕定位于“陈留兖州政治文化势力”的代表,着重论述他在陈留兖州地区的家族式、地域式的文化活动。第二个层面,将蔡邕定位于南北文化交流的使者,抓住“蔡邕流亡吴会”这一典型事件,以文献的挖掘和阐述为主,尽可能“复原”蔡邕流亡期间在中原、在吴会的文学活动状貌,通过具体可感的文学艺术活动展现他的文坛地位,以及对吴会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第五、六章转换视角,论述流寓中原的东汉文学名家在中原的文学活动及其意义。以班固、崔骃、傅毅、王逸等人为代表的流寓文士对东汉文学贡献不菲。他们在京洛的文学活动往往受国家意志支配,

文学主张主要是其国家意识的反映，他们在中州的文学创作与时政变革、文化制度乃至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其作品也借京畿这个典型的文化集散平台得以快速传播。这一点正好体现出东汉中原京畿文化的特色，即集中反映国家意志，引导文化主流。

东汉中原的文学繁荣是由中原本土士人和长期寓居中原的士人共同创造的。东汉前七八十年里，以三辅士为主的流寓文士是活跃在中原的文学创作主力。和帝永元年间，三辅文学名家相继去世，关中文学力量明显衰微，与此同时，中原文士群体登场，张衡、蔡邕、曹操三代文宗相继出现，引领了汉魏主流文风的发展演变。

第七、八章再度转换视角，从外戚幕府文学和皇族文学的角度论述中原文学的特殊性。

东汉大多数文学名家都与外戚幕府有关。外戚幕主的地域文化性格往往会对整个幕府产生影响，如幕府的人员构成，幕府文学创作的题材、主题、风格、文体使用等。外戚幕府文士的聚散离合也是章帝以后东汉政治文化局势的一面镜子。自章帝始，东汉有八个外戚先后开设“三公”级幕府，但辟举人才的侧重点有阶段性差异：章帝、和帝之世，马防幕府、窦宪幕府所辟多文学名士；安帝、顺帝、桓帝时期，邓骘幕府、梁商幕府及梁冀幕府辟除的多是“经明行修”的儒士；灵帝、献帝时期，窦武、何进唯“名士”是举。东汉外戚幕府辟举重点的变化是士大夫、外戚、宦官三种政治力量消长变化的晴雨表。

东汉皇族学养深厚，多能文之士。本书将东汉皇族的文学活动放在国家政治文化视野下做深度剖析，揭示了以明、章、灵三帝为代表的东汉皇族与汉魏文学发展之间的联系。汉明帝重经学，轻文学，晚年始广征文学名士入宫。章帝爱好文学，承明帝晚年之制，采取“左右艺文”的文化平衡政略，以文学取士，鼓励文学创作，这不仅促进了章和之际的文学繁荣，且对东汉中后期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汉灵帝以俗文艺取士，助推汉末文风从典重渊雅向轻巧俗丽转变。

秦汉地域文学研究和秦汉文学地理研究都很少有人涉足。首要原因是史料严重匮乏，特别是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作品流传太少。另外，

传统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难于把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或引向新的领域。但是,学术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地积极探索。为此,本书对秦汉文学地理与秦汉地域文学做了多方面新的尝试。

地域文学的独特处在于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地域文学研究的意义首先也是发现和揭示作家、作品的地域特色。然而,流传下来的秦汉文学作品数量极少,文学性较强的诗歌、辞赋、小说、杂体散文中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史料显示:秦汉人的乡土观念非常强,强烈的乡土观念不仅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家族联姻等社会生活方面,也渗透在政策制定、经济发展、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重要领域,有时甚至影响到国家战略性区域布局。文学家的地域观念,尤其是故土意识或故土情结,必然会以多种方式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如何从极少量的作品和极其有限的史料中发现和揭示秦汉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这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

本课题的地域文学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思路:

一、以“故土意识”为中心,从其外化行为与文学表述两个角度,研究某些重要文化区的文学风貌。故土意识经常外化为某些带有地域倾向性的具体行为,表现在人际交往、政治生活、经济活动、文化活动诸方面,由此切入,可以考察某些地域文士群的共同特点,进而发现其故土文化性格,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究这种故土意识和故土文化性格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比如,第一章第五节先探究了东汉皇族的帝乡意识在帝乡政策、皇族婚姻、文化生活等多个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而发掘了皇族的帝乡意识及其外化行为对南阳及周边地区的具体而又深远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对东汉江汉文化的较快发展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也从源头上揭示了江汉文学在汉唐间繁荣的地域文化原因。第六章第一节着重研究了东汉关中外戚幕府文士的关中情结如何通过人事行为影响其政治文化生活,第三节具体分析了东汉关中外戚幕府文士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关中色彩”,在解读作品的过程展现了关中文士的故土情怀,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关中政治文化地位的变迁。第五章第四节从家族文学的角度研究了马援家族和

班固家族在中州的文化活动与创作情况,分析了这两个望族殊途同归的关中文化性格。第四章第一节论述张衡的诗文风格时,顺便探究了荆楚文化的跳跃性思维和好尚灵动的风气在张衡文学创作中的生动表现;同章第二节论述了蔡邕对兖州人事的特别关注,揭示了他的故土情结及其文学创作在汉魏文化传承中的桥梁作用。

二、从地域文化与文学家族的角度,研究某些地域的文学生态与文化特色。第三章关于中州本土文学家族的论述就是遵循这一思路展开的。东汉时,中州名郡,京都洛阳之外,还有南阳、汝南、颍川三郡。这三郡文学家族群的兴起各依托本郡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风习,在汉魏文学嬗变中,三郡文士群也表现出了风格各异的地域文化性格。

三、从文学主张、文学题材及文体入手,论述京畿文学的独特之处:反映国家意识,引领文化主潮。在东汉,以兰台文士、东观文士为首的京官文士群是京都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这个群体的文学创作很有特点:题材以都邑、巡狩、祥瑞、治政、荐士为主;常用主要文体是奏疏、辞赋、箴铭,章帝以后,连珠体也很盛行;文学主张主要是国家意识的反映。也就是说,京官文士群体(包括太学生)兼有“文士”和“朝官”双重性质,其创作往往围绕治国理政展开,宣扬国家意识,传播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很少表露个体情感,文风典正温雅,代表着主流文学的发展方向。第五章即以流寓文士的创作为例论述了东汉京都文学的上述特色。

方兴未艾的文学地理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但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尚需大大拓展,研究实践也还很不够。从空间上说,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的人文地理环境主要是文学家籍贯地和创作地,文学家成年以后长期生活的地方(通常称为“第二故乡”)也很重要。如果生长地、“第二故乡”和创作地重合为一,该地人文环境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就会远大于籍贯地。东汉时期,那些累世生活在洛阳的文学之士或文学家族的情况正是如此。为此,本书侧重从创作地理角度做了两方面的尝试:首先,从宏观上考察了东汉文学创作地理的整体格局及其演变轨迹(见第二章),其次,具体考察了流寓文学家在中州

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情况（见第五章）。研究结果显示：1. 东汉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是文学创作最集中、最活跃、最繁盛的地区，也就是说，中州是东汉二百年间的文学创作地理中心，成就突出的文学家多是兰台文士、东观文士或外戚幕府文士；2. 东汉文学创作中心随京都的迁移而转移，但始终在中州地区；3. 东汉文学创作的繁荣是由本土文士与流寓文士共同创造的，汉安帝之前，活跃在中州的最富创作活力的文学力量以关中文士为主，之后以中州本土文士为主；4. 东汉大多数文学名士长期生活在中州，其文学创作也主要是在中州完成的。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东汉文学创作关系最为紧密的文化空间不是文学家籍贯地，而是其主要创作地——中州。

本书还探讨了文学家的流动（或可称为“动态文学地理”）与其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见第四章第二节与第二章第四节。

总之，本书是第一部从地域文化和文学创作地理角度系统研究东汉文学的专著，也是第一部从局部地域观照东汉整体文学嬗变的著作，对东汉时期的文学创作地理、皇族文学、外戚幕府文学、中州本土文学家族、京畿文学的特色等问题，都有一些独立的思考和心得，希望能为相对冷淡的东汉文学研究和方兴未艾的中原文化研究增添一些新的元素。

关于本书的薄弱之处和有待延伸的论题。东汉经学鼎盛，中州为其腹心，经学与文学在中州经历了怎样的离合，本书的论述较为简略。东汉文学家族非常活跃，本书的个案研究还远远不够。东汉在洛阳设立的文化机构很多，有太子舍、黄门鼓吹署、太学、鸿都门学、公卿幕府等，这些机构拥有庞大的文士群，其文学创作也是中州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本书未予论述。东汉皇族作为一个博学好文的特殊文化群体，关于皇族文士群的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也还有很大空间。

限于著者学力浅陋，时间仓促，文中定有不少欠妥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